

# 铁军传奇 红色记忆

## 盐都抗战故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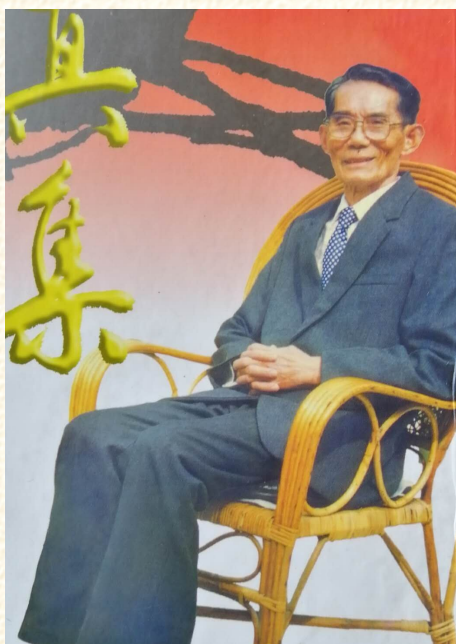
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 主办  
盐都区融媒体中心 承办

# 烽火岁月担大任

### ——抗战时期盐城县党政领导的红色记忆

【编者按】1941年夏,日军纠集十七师团、独立十二旅团和伪军李长江、杨仲华部共17000余人,分别从东台、兴化、射阳、陈家港等地,分四路向盐城合击。不久,盐城境内主要集镇、重点村庄成为敌人据点,碉堡林立,遍地狼烟。9月,为了冲出敌人的分割包围,便于抗战,华中局决定将原盐城县划分为建阳县、盐东县、盐城县。在敌后抗战期间,周利人、周一萍、骆明同志先后担任分县后的首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、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。他们临危受命,带领全县人民经过五年浴血奋战,夺得了抗战的全面胜利。现由区新四军研究会组稿,刊登他们生前撰写的回忆文章,再现当年烽火连天的峥嵘岁月,让我们重温盐城红色抗战历史。

## 骆明:在盐城坚持抗日战争的五年



我于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下旬,从淮南调到盐城,分配到盐城县政府工作,当时县长是贺希明,我担任县政府秘书。

一九四一年六月,根据所了解到的敌情,驻泰州一带的敌伪军准备对苏北根据地进“扫荡”,华中局和军部及时发出指示,做好反“扫荡”的准备。为了便于坚持游击战争,区党委决定将盐城县划分为盐城、盐东、建阳三个县,盐城县委书记是周利人,县长是我。建阳县委书记金韬,县长唐君照。盐东县委书记孙海光,县长魏心一。原盐城县政府的干部,分到三个县政府。如林英杰、傅宗华、鲁立、黄其明、黄岗等同志分到盐城县政府分别担任秘书、公安、军事、文教、财粮科的科长。县的武装叫盐城抗日自卫总队,下辖四个大队,第一、第四大队原来就驻在新划的盐城县境内,留给盐城部队的领导人开始是张志勇同志,不久,派来李彬山同志。县委、县政府一成立,就立即紧张进行反“扫荡”的最后准备工作,直到九月盐垣行政公署才发布命令,把原盐城县政府的铜印颁发给我们。

一九四一年七月,驻泰州的日军南浦旅团一万余人纠集伪军二万多人,由东台、兴化等地向北进攻,沿途烧杀抢掠,于七月二十日占领盐城。早在敌人占领盐城之前,华中局军部、盐阜区党委已向北撤到阜宁,贺希明也带一批干部撤到阜宁到盐垣行政公署工作。县委、县政府也分批下乡,分到各区督促工作。

在敌人占领刘庄急迫向北进犯的时候,我同张志勇同志从盐城南门出城下乡到冈沟堆(一区)带上县大队第四大队,这个队伍约三百多人,是大刀阔斧开辟盐城根据地时期几个月内动员组织起来的,在敌人占领场河向盐城进攻时,四大队在便仓、伍佑之间打了一仗,这支队伍武器差,没有经过战斗锻炼,我们也没有经验,经不起打,一打就垮了,少数被打死或被俘虏,多数开小差跑了。晚上在离伍佑西边十几里一个庄子上收容起来,剩下不到一百人,当天晚上半夜叛变了,把教导员、指导员杀害了,随我们行动的青年服务人员大部分被俘虏去了(都是些十五、六岁的青年同志),有两个年轻的女同志,当日伪军押着他们过桥进伍佑的时候,从桥上跳水自杀,宁死不屈,充分表现了她们崇高的民族气节,革命气节,值得我们永远崇敬。

我同张志勇同志没有受害,是由于我们把队伍剩下的人员收容起来之后,正在进行善后工作,接到贺希明同志派来通讯员带来的信,说是在撤向阜宁途中,刘少奇同志作了关于反“扫荡”的紧急指示要他来传达,他跑了一天一夜到了五区的北蒋庄,要我们立即赶到他那里去听传达,并说他不能久留。我和张志勇同志立即赶到北蒋庄,贺希明同志传达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,主要内容是:敌人“扫荡”所到之处,有些坏

人当了汉奸,恐吓群众,勒索群众的猪、鸡、鸭、蛋等,打起太阳旗,欢迎日伪军,对这种汉奸行为要坚决镇压,决不手软,要以此作为稳定人心,争取群众,站住脚的首要任务。听完传达后,就同贺希明同志分手,(后来知道,第二天拂晓,他遭遇敌人,经战斗后才甩开了敌人北去)急忙赶回,半路上得到通讯员报告队伍叛变的消息。回到原来住的庄子上,叛变的队伍已拉走了伍佑,有少数同志躲在草堆里,未被带走。处理了善后工作后,很快转到五区。到了五区,找到了第一大队(也是三百多人),大队长是陈镜心。接受了四大队叛变的教训,立即着手整编一大队,把成分不好的洗刷回家,多下来的枪,就用稻草捆好,设法埋藏起来。经过整顿,一大队还剩下二百余人,抓紧对干部战士进行教育,几天后,突然遭到敌人三面包围,也是经不起打,有些牺牲了,多数是开小差跑了,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。这时,除盐城之外,从大冈、伍佑、龙冈、秦南仓、楼王、北宋庄、沙沟以至兴化的大邹庄都住上了敌人,安下了据点,经常出来“扫荡”。怎么办?我们商量之后决定把长枪埋藏起来,军装换成便衣,带短枪打游击。首先是展开镇压汉奸活动,坚决执行刘少奇同志的指示,镇压汉奸,稳定人心。并设法同在三、六区活动的周利人同志取得联系,同在四、五区活动的周一萍同志取得联系,转告了刘少奇同志的指示,通报了我们的情况和打算,很快和周一萍同志会合。我们都组织了便衣队到各乡各村活动,凡日伪军下乡“扫荡”,下乡烧杀抢掠时,敢于为敌伪军带路,打起太阳旗,欢迎日伪军的,勒索群众财物,残害群众的,一经发现后立即镇压,并广泛进行宣传,动员群众起来同日伪军、汉奸作斗争,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,保卫家乡。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,把汉奸的猖狂活动镇压下去了,人心慢慢稳定下来。接着组织、整理、发展农救会、妇救会、青救会。不久前,我到盐城见到的金如远同志,他就是五区北堡乡的第一任乡农救会会长。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组织民兵,那时,民兵也叫自卫队,脱产的叫基干队,每个乡一个基干队,不脱产的叫自卫队。站岗放哨,盘查行人,搞侦察,送情报,镇压汉奸活动,敌伪军下乡时,打打冷枪,打击小股的伪军,打了就跑,有时晚上对小据点进行骚扰,这样来训练民兵。并逐步从乡的基干队中选调一些战士建立区大队,再逐步选调一些到县里来。县总队由县长兼,李彬山同志任副总队长,政委是周利人同志。李彬山同志是老红军,有战争经验,我同他经常一起活动,我不会打仗,向他学,他教我打仗。他文化水平不高,要我教他学文化。我们共同合作得很好。不久,我们同县委、县政府机关会合,同机关一起行动。那时的县委、政府的机关是短小精干的,人数很少,大多数同志经常分到各区帮助工作。周利人和刘大漠同志很长一段时间在三、六区帮助工作,有时回到县委来开会。我们的工作不像现在这样复杂,主要的任务是发动群众,建党,搞武装,开展统一战线工作,敌伪军工作,坚持抗战。政府也领导生产,办教育,小学、中学都有,不过都是分散在几个村庄上教学的。征公粮、收税,保证供给。生活是比较艰苦的,干部、战士一律每天一斤粮,一斤青菜,三钱油,三钱盐,实行供给制,衣服鞋袜公家发。开始还没有津贴,后来情况好转,生活发展,才每人每月发五角钱津贴。

一九四三年秋以前,我们一直在运动中工作,很少在一个村庄连续住上两夜。情况紧张时一个晚上移动几个地方。警惕性高的时候,也正因此,我们很少受到突然袭击的损失。

最困难的是在一九四二年,敌人“扫荡”频繁,另一个是灾荒,农业歉收,群众生活困难,这不只是盐城,各个根据地都遇到了这种情况。这年的秋天,敌人在苏中四分区“清乡”,并逐步向北推进,在盐城叫“清剿”。敌伪军深入我中心区“扫荡”以后,除

了交通沿线的原有据点之外,又增设了许多据点,甚至在中心区如一、二、四区也安了临时据点,下乡袭击,沿乡沿村“清剿”,这样,部队在据点中间的活动,一个排的行动都困难了,据点化整为零,分散行动,化成一个班,一个小组打游击,在据点中穿插,打击下乡骚扰的汉奸和小股敌人。有时设法在晚间进入据点,捕杀作恶多端的汉奸。这段时间,斗争更为艰苦,曾有一段时间同地委的联系被隔断。牺牲了一些同志,有些同志被俘,我们通过敌伪军工作的关系做工作,花些钱营救出来,也有个别的经不起考验而叛变投敌。叛徒对我们的危害最大,我们最痛恨,千方百计设法捕杀。就在那样艰苦斗争中,也还抓生产,执行党中央的号召,组织群众生产自救,渡过难关,干部战士在很少的供给中,节衣缩食,节约粮食救灾。机关、部队在经常活动的村庄种菜,自己纺纱,行动到一个村庄时,用上纺车纺纱,开始纺出的纱有火柴杆那么粗,经过一段时间纺出的纱就细了。

这样比较艰苦的斗争,时间不太长,大概有四、五个月的时间,我们的主力部队南面的新四军第一师(粟裕同志领导),北面的新四军第三师(黄诚同志领导)积极在各地发动进攻,打击敌人,攻克不少敌伪军据点,迫使敌人收缩据点,龟缩到交通线上的一些主要据点,我们也配合主力部队的行动,深入到据点周围,包围袭击一些据点,伪盐城一区一个姓夏的伪区长,就是这时被我们的游击队捕杀的。伸入中心区的一些据点也被迫撤退,敌人对盐城的“清剿”被粉碎了。

县的武装力量在斗争中逐步壮大,把一部分区大队提升到县里,一九四二年夏县抗日自卫总队改为县独立团,县长兼团长,副团长李彬山,政委周利人,从一个营发展到两个营,一九四三年秋就有三个营了,区大队也发展了,武器也有改善,上面补充一些,主力部队给我们一些,我们配合主力部队打了些胜仗缴获一些,县独立团轻机枪也多几挺了,也有了掷弹筒,也能独立打些小据点,打些较大的仗了,环境大大好转,可以在中心区的村庄上住上几天,召开一些规模较大的会议,讨论部署工作。一九四二年冬,李彬山同志带独立团一部到主力部队去了。一九四三年五月,马仁辉同志带七旅二十一团二营来盐城县,组建独立团。周利人同志调走,周一萍同志担任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委。

粉碎敌人清剿之后,一方面继续做好各方面的工作,巩固中心区,同时向西面发展,加强楼王、北龙港一带的工作,建立了义丰堤行政办事处,打击国民党韩德勤顽固派的残余和土匪,扩大根据地,逐村逐乡发动群众,建立政权,建立武装。盐城地区扩大了,敌人只能龟缩在交通线上的几个据点,也不敢轻易出来骚扰了。

一九四四年七月,我离开盐城,去华中党校整风学习。一九四五年三、四月,整风结束,仍回到盐城工作,这时的斗争,主要是积极开展斗争,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。九月,日寇投降,我奉命调去盐阜区(也叫五分区)专署工作,离开了盐城。

回忆在盐城那几年的斗争,在那样一种环境下能够坚持斗争,最后取得斗争的胜利,主要是盐城的全体同志同心同德,团结一致,在区党委、地委的领导下和新四军的主力部队的支持下,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坚持抗日斗争,坚持敌后斗争的方针,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的。坚持抗战,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,我们一切工作都围绕武装斗争展开,为武装斗争服务,争取武装斗争的胜利。敌人侵占盐城之后,东面从刘庄、便仓、伍佑到盐城,南面从刘庄到大冈,兴化县的邹庄,西面从沙沟到秦南仓,北面从龙冈到盐城都安上据点,驻上日伪军,构成封锁线,经常出动下乡“扫荡”,抢粮烧杀,派出汉奸便衣队侦察我们的情况,袭击乡村干部和民兵。盐城西部的顽韩残余土匪结合在一起,在荡区

进行破坏骚扰。在这种情况下,不武装起来无法工作,也无法生存。县委、县政府没有一支队伍不行,区、乡没有武装不行,县、区、乡的干部,分散工作的时候,到城镇(许多是敌伪据点)收税的同志,每个人都要武装起来,带上枪才可能进行工作。随时准备战斗。那时我们每个同志最宝贵的就是自己一刻也离不开的短枪,经常擦拭,和别的同志比谁的枪好,搞到几颗子弹就高兴得不得了,战斗胜利从缴获中换到一支更好的枪,高兴得几天睡不着觉,真是爱枪如命。

敌人比我们强大,我们还只是打游击,捕捉下乡来活动的汉奸,袭击小股出来的敌人,晚上到据点附近活动,骚扰敌人,破坏敌人的电话线、交通线,截夺敌人运输物资,打击敌人,保护群众。后来县队扩大了,力量增加了,也能够打一些像样的仗了。如在交通线上伏击敌人,消灭敌人的小队伍,有把握时也攻取一些小据点,我们能够坚持武装斗争,很重要的还靠主力部队的支持。当时常在盐城活动的是新四军一师二旅四团,团长刘别生,政委郭猛,参谋长饶惠谭。郭饶两同志来盐城活动较多,他们有时带一、两个连,有时带一个营来盐城活动,支持我们,打击敌人,掩护我们开展工作,保护群众利益。他们对地方工作很关心,常同我们研究工作,如何坚持斗争,打开局面。战斗缴获的武器分给我们,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,同我们相处得很融洽,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郭猛同志不幸在一九四二年反“扫荡”一次胜利的战斗中牺牲了。那是在城南一区的一次歼灭敌人下乡“扫荡”的战斗中,战斗已经把敌人消灭了,郭猛同志正站在一个堆上指挥战士们收集武器和俘虏,打打战场,被一颗流弹打进咽喉,抢救无效牺牲了。原来我们预料到这次战斗一定会胜利,已准备好开一次庆祝会,战斗结束后群众纷纷挑着慰劳品来慰劳,知道郭猛同志牺牲的消息后,许多同志和群众都哭了,战士们也一起哭。郭猛同志我们永远忘不了他,怀念他。

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,从斗争实践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,坚持斗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,在那样艰难的斗争中一刻也离不开人民群众,离开了人民群众不但什么事也做不成,连生存都不行。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,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,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动员群众,依靠群众的力量把事情办成功、办好。为此,我们经常学习,教育自己、教育干部,教育党员要树立群众观点,为人民服务的观点,依靠人民的观点,那时,盐城人民生活是困难的,他们仍然节衣缩食养活我们,给我们吃和穿,支持我们的斗争,同我们一起战斗,不顾危险,查敌情送情报,掩护我们的同志。许多群众在敌人“扫荡”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、救护我们的同志和伤病员,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、亲人来保护,有的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,这种可歌可泣的感人事例多得很。在斗争中我们受了损失他们很伤心;我们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就高兴,鼓励、慰劳我们,同我们同呼吸共命运。许多群众积极参加了民兵,区大队、县队,扛起枪杆子打敌人。盐城是个水网地区,敌人的汽车、骑兵很难活动,他们就利用快速的汽艇在河里闯来闯去,袭击、扫荡。我们同群众商量对付办法,在河里打坝阻止汽艇的活动。开始坝筑得不牢固,敌人用炮轰很快就轰开了。后来,在打坝时打下木桩,用铁丝串联起来,果然坚固多了。最后又改进,打成暗坝,不露出水面,既阻止了敌人汽艇的活动,又不妨碍农田用水。有时把树砍下连树枝一起放到河里,在河里养水草,使敌人的汽艇无法行动,这些坝又长又宽,工程不小,没有群众的力量是搞不起来的。一句话,我们是依靠群众才能坚持斗争,才能取得斗争胜利的。

统一战线是一项重要的工作。我们按照中央的方针是做得不错的,在民族、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,除了极少数极端反动分子和死心塌地的汉奸之外,包括上层人

物、知识分子都是有爱国心的,是同情、赞成抗战的。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时,刘少奇、陈毅等同志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上,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,打下了基础,盐城县的参议会就是陈毅同志直接指导下组织起来的。敌人占领盐城之后,许多开明士绅、民主人士,知识分子都下了乡,我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,团结各阶层抗日人士,宋泽夫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宋泽夫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,民主主义者,盐城县参议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议长,以后还被选为盐阜区参议会副议长,对坚持抗战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,不少上层人士、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抗战,做了不少工作,不幸一九四二年冬被敌伪逮捕残害,脱险后伤病成疾,医治无效逝世。我们至今还怀念着他。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,我们应当提到还寄萍、宋金城、胥大河、陈镜心等同志,他们是盐城人,和盐城各方面的人士有广泛的联系,他们在这方面积极努力,做了不少工作,起了很大作用。通过他们去做工作,联系、团结爱国民主人士,开明士绅,支持减租减息的政策,改善人民生活,团结群众,支持抗战。

敌伪军工作也应该算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。这方面主要工作是县委的敌伪军工作部,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龚少波同志、陈少键同志。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毕竟是少数。因此,军事上给予打击施加压力,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,开展对伪军、伪组织人员的工作,向他们宣传抗战的道理。党的政策、积极工作把一些有民族良心的人争取过来,同我们建立关系,为我们做工作,送情报,掩护我们的侦察人员进据点去活动,巧妙应付敌人,使据点附近的群众少受些损失。为我们采购一些紧缺物资、药品,甚至武器,在据点附近组织两面政权,应付敌人,为我们工作。开展敌伪军工作对我们的坚持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
在盐城坚持抗日斗争五年的日子里,我同盐城的同志们,盐城的人民,共过生死,共过患难,共同战斗,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我永远忘不了,时常在怀念着,随着时间的逝去,这种感情越来越深,我向他们致意。

骆明(原名苏斌),1916年6月出生于广西灵川县,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党组织派遣北上抗日,先在新桂系及其辖地豫、皖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后在新四军中工作,在盐城任县长,抗战5年。解放战争时期,历任苏北盐阜专区处长、副专员、专员兼支前司令,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等职,参与了淮海、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回广西工作,先后任梧州公署专员、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政法委副主任、省财委副主任、省财贸部副部长、省交通部副部长、省委宣传部部长、平乐地委第一书记等职。1958年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下放农场;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复出工作,先后任自治区计委副书记、副主任,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,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、顾问兼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。1985年离休。1998年10月在南宁病逝。

(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整理)

物、知识分子都是有爱国心的,是同情、赞成抗战的。华中局、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时,刘少奇、陈毅等同志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上,已为我们做出了榜样,打下了基础,盐城县的参议会就是陈毅同志直接指导下组织起来的。敌人占领盐城之后,许多开明士绅、民主人士,知识分子都下了乡,我们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,团结各阶层抗日人士,宋泽夫先生就是这方面的代表。宋泽夫先生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,民主主义者,盐城县参议会成立时他被选为议长,以后还被选为盐阜区参议会副议长,对坚持抗战给予很大的支持和帮助。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,不少上层人士、知识分子都参加了抗战,做了不少工作,不幸一九四二年冬被敌伪逮捕残害,脱险后伤病成疾,医治无效逝世。我们至今还怀念着他。在开展统战工作方面,我们应当提到还寄萍、宋金城、胥大河、陈镜心等同志,他们是盐城人,和盐城各方面的人士有广泛的联系,他们在这方面积极努力,做了不少工作,起了很大作用。通过他们去做工作,联系、团结爱国民主人士,开明士绅,支持减租减息的政策,改善人民生活,团结群众,支持抗战。

敌伪军工作也应该算是统一战线工作的一部分。这方面主要工作是县委的敌伪军工作部,负责这一工作的是龚少波同志、陈少键同志。死心塌地当汉奸的民族败类毕竟是少数。因此,军事上给予打击施加压力,同时通过各种社会关系,开展对伪军、伪组织人员的工作,向他们宣传抗战的道理。党的政策、积极工作把一些有民族良心的人争取过来,同我们建立关系,为我们做工作,送情报,掩护我们的侦察人员进据点去活动,巧妙应付敌人,使据点附近的群众少受些损失。为我们采购一些紧缺物资、药品,甚至武器,在据点附近组织两面政权,应付敌人,为我们工作。开展敌伪军工作对我们的坚持斗争也起了重要作用。

在盐城坚持抗日斗争五年的日子里,我同盐城的同志们,盐城的人民,共过生死,共过患难,共同战斗,结下了深厚的感情,我永远忘不了,时常在怀念着,随着时间的逝去,这种感情越来越深,我向他们致意。

骆明(原名苏斌),1916年6月出生于广西灵川县,1936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时期接受党组织派遣北上抗日,先在新桂系及其辖地豫、皖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后在新四军中工作,在盐城任县长,抗战5年。解放战争时期,历任苏北盐阜专区处长、副专员、专员兼支前司令,苏北第十一分区专员等职,参与了淮海、渡江战役的支前工作。

新中国成立后南下回广西工作,先后任梧州公署专员、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兼政法委副主任、省财委副主任、省财贸部副部长、省交通部副部长、省委宣传部部长、平乐地委第一书记等职。1958年被错划为“右派”,下放农场;“文革”中遭受迫害。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复出工作,先后任自治区计委副书记、副主任,自治区人民政府秘书长,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、顾问兼自治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等职。1985年离休。1998年10月在南宁病逝。

(盐都区新四军研究会整理)

